

#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考论

柳 森

**提 要：**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清代西藏方志中所载西藏地情内容最多者。经笔者考证，该志实际编纂者为汪仲洋，其广泛参考官修通史通志类著作，大量引用松筠《西招图略》等私人涉藏诗文作品，并在编纂门类方面有所创新。虽存在信息滞后、内容错漏及引用不当等问题，但该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雍正末期至嘉庆初期西藏的历史发展与地情变化，对之后西藏方志编纂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 汪仲洋 成书背景 史料来源 不足之处

嘉庆《四川通志》204卷首22卷，目前仅见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该志凡12志、68门、226个子目，约388万字，内容远超雍正《四川通志》。其中，卷191—196为《西域志》，记事止于嘉庆十九年珂宝克出任驻藏大臣一事。其中，先分地域、再分篇目，地域分别为江卡、乍丫、木多、类伍齐、洛隆宗、硕般多、达隆宗、拉里、江达、前藏、江孜、后藏、定日、阿里、廓尔喀、布鲁克巴、缠头、卡契、库呢、白木戎、披楞、第里巴噶、巴尔底萨杂尔。其中，前藏内容最为详细、篇目最为齐全，约4万字，其篇目有历史沿革、星野、疆域、形势、风俗、城池、户口、津梁、关隘、贡赋、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物产、管辖地方头人、赏给达赖喇嘛各地方户口钱粮、西藏管辖三十九族等19个篇目，其中又以沿革和山川所载内容多为多。之后为国朝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西域蕃酋、西域喇嘛等特色内容，最后，为西域志余并附录成都入藏路程等程站情况。相比成书较早的《藏纪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及《西域全书》《西藏志》《西藏记述》《卫藏图识》《西藏赋》《卫藏通志》等清代西藏志书，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收录更多西藏史地内容，同时，更令在其后成书的《西藏纪闻》《西藏图考》《巴塘盐井乡土志》《西藏新志》等清代西藏方志在内容体量方面望尘莫及，因此，其史料之丰富堪称清代西藏方志之最。鉴于此前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笔者在此对其实际编纂者、成书背景、史料来源、价值与不足之处进行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 一 实际编纂者为汪仲洋

嘉庆《四川通志》作为官修省志，按惯例不会详细记载各门类的实际编纂者，而仅在“四川通志修辑职名”罗列参修人员衔名。其中，“总裁”为时任四川总督常明，“编辑”为户部员外郎、会典馆总编纂杨芳灿，以及候补同知谭光祐。按照方志编纂责任者著录惯例，后世多将嘉庆《四川通志》责任者著录为“（清）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祐等纂”<sup>①</sup>。嘉庆十七年（1812），常明开始监修《四川通志》，并聘杨芳灿入蜀为主纂，十九年冬完成初稿，继而增删历两年有余，至二十一年刊刻成书。

众所周知，嘉庆《四川通志》这类官修职务作品，领衔者均为一省大吏，位列纂修衔名前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737页。

列者均是省内道府州县的高级长官，但因政务繁忙、能力所限，他们参与实际纂修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们不能将嘉庆《四川通志》主要责任者等同为该志的实际编纂者。学界之前已有成果均未揭示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出于何人之手，经笔者考证，其实际编纂者为汪仲洋。

汪仲洋（1777—？），字少海，号海门，四川成都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二十二年以举人大挑一等，分发浙江监办河工。先后署理桐庐、山阴县事，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任钱塘知县。<sup>①</sup>道光元年（1821）任海盐知县，“仲洋悉心经画，不辞劳瘁，在任四年，筑塘八十余丈，视旧塘尤坚固，历久屹若金城，人称为‘汪公塘’。刻有《塘工成案》，筑法甚详。工吟咏，公余赋诗纪事，和者甚众，有《海孺唱和诗》六卷”。<sup>②</sup>其中，《塘工成案》即《海盐县新办塘工成案》一卷。五年八月，钱塘知县汪仲洋因治下发生要犯狱中自缢事件被革。后任海盐县教谕、钱塘县丞，署理余姚知县。二十年八月，适值鸦片战争爆发，“再本月二十等日，有大小夷船数只，驶入慈溪、馮姚境内，直逼海岸。经宁波府知府邓廷彩、署理余姚县知县汪仲洋会督文武及兵勇人等，先后将夷舟击沉，拿获夷匪二十余名”<sup>③</sup>。对此，林则徐作《赠汪少海》云：“旋涡妙策沉番舶（庚子夏，逆夷扰浙，君用奇计诱夷舶陷软沙，俘获甚众），烈焰神机转炮车（镇海铸大炮百余，分运各台，君领其事。《汉书》注‘霹雳车’，即今炮车）。东望蛟门抒高咏，诗题崖岫合笼纱。”<sup>④</sup>二十一年四月，任余姚知县。其留心西学，关心洋务，与林则徐、嘉兴县丞龚振麟研制新型火炮与战船，著《铸炮说》《安南战船说》等。其工于诗文，著《心知堂诗稿》18卷。值得注意的是，汪仲洋有关英人的扭曲认知“英夷之腿极长，青布裹缠，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sup>⑤</sup>，对时人及后世有较大负面影响。

汪仲洋在为明嘉靖间四川按察使金应奎所作缅怀诗中注曰：“嘉庆癸酉，重修《四川通志》，仲洋与杨蓉裳、谭铁箫两丈，谭静山、张渔璜、严丽生在局，《职官》《人物》两门比旧志约增十之六七。”<sup>⑥</sup>同时，汪仲洋《校试迄率成长句六首》曰：“雪栈巉天一线开，筹边人记入川来。曾从幕府参书局（甲戌，监临中丞以方伯总裁《四川通志》，洋时分修在局），更作衙官试吏才。”<sup>⑦</sup>由此可知，当时入幕的汪仲洋于嘉庆十八年（1813）、十九年之际，正参与纂修嘉庆《四川通志》之《职官》《人物》。同时，在嘉庆《四川通志》“编辑职名·分辑”中，确有“成都府成都县辛酉科举人汪仲洋”。可见，汪仲洋所言不虚。值得一提的是，汪仲洋呈诗曾任驻藏大臣的松筠，在两首长诗中均强调其独自编纂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一事。汪仲洋《以所撰西域志六卷呈松相国得长句一首》曰：“往于《四川通志》局分修《职官》《人物》两志后，又独编《西域》。”<sup>⑧</sup>同时，又在《寄呈相国松湘浦夫子即寿八秩之庆》写道：“忆昔纂蜀志，万卷搜縹緲。独办康藏卫，搦笔心徜徉。西招未阅历，臆度无琳琅。幸得新鸿宝，万里如门墙（洋修

① 参见李榕纂修：民国《杭州府志》卷102《职官四》，民国11年（1922）刻本，第19页。

② 王彬纂修：光绪《海盐县志》卷14《名宦录二》，光绪二年（1876）刻本，第31页。

③ 齐思和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490页。

④ 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5，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9页。

⑤ 汪仲洋：《庚子六月闻舟山警》，转引自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191页。

⑥ 金应麟：《金氏世德纪》卷下，道光间刻本，第66页。

⑦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卷16，道光七年（1827）刻本，第3页。

⑧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卷17，第7页。

《四川通志·西域》一门，考核多本《西招图略》。”<sup>①</sup>由此可见，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实际编纂者应是汪仲洋。

## 二 成书背景

首先，嘉庆《四川通志》是《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政令产物。此前已有两部《大清一统志》问世，其一为乾隆八年（1743）成书的342卷本《大清一统志》，因记事下限至康熙时止，因此，该志被后世称为康熙《大清一统志》；其二为乾隆四十九年成书的500卷本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时至嘉庆十七年，国内情况已较前朝发生较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户口日盛、田赋日增、区划变迁、边疆稳定，为了及时记载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间的国家总体发展情况，当年四月，嘉庆帝诏令天下重修《大清一统志》。由此，嘉庆十七年四川总督常明开始监修《四川通志》，为《嘉庆重修一统志》提供资料储备与纂修参考。

四川为多民族聚居地区，雍正《四川通志》即已因地制宜地专门设立《西域》一门，而嘉庆《四川通志》中沿袭这一体例设置并增删相关内容应属必然之举。同时，编纂者在嘉庆《四川通志》中继续收录西藏内容的原因，与雍正《四川通志》、乾隆《雅州府志》等如出一辙，即四川毗邻西藏，两地经济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而西藏也曾是四川边防的重点对象之一。因此，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主要内容即描述西藏地情。

其次，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增补西藏内容的另一原因是西藏地方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乾隆末年，西藏地方发生了两次廓尔喀入侵事件，严重损害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与行政管理秩序，由此，清中央政府最终以武力击退廓尔喀侵略势力，恢复了西藏地方社会秩序，同时还以此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中央政府对藏实施主权管理的体制改革，而西藏地方社会重建业已初见成效。其时之形势，恰如时任云南巡抚陈若霖为该志作序曰：“圣天子重熙累洽，声教暨讫，遐迩同风，北连青海土户赋马矣，西慑山番屯练从军矣，小大金川设官，前后卫藏置吏，而又巴勒布输诚，廓尔喀向化，揆文奋武，干羽两阶，普天率土，为盛世献威登之瑞，夫岂触蛮争角狐兔，跳梁之庶顽小丑所能戴光化之天勤，宵旰之听，而传信家足以铺张者哉？”<sup>②</sup>有鉴于此，尚处于地方经济社会重建阶段的西藏，依然能够引起嘉庆帝的高度重视，而四川督抚大员更不敢怠慢，必然会在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中增补西藏内容以彰显其政绩，如将天文、輿地、人物等皆纳入，对前后藏史料及边防土司记载详核，同时，还创新性地增加了国朝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西域蕃酋等之前清代西藏方志所欠缺的篇目内容。

再次，雍正五年（1727），清中央政府主持完成四川与西藏划界，遗憾的是，成书于雍正十一年（1734）的雍正《四川通志》并未如实反映这种变化，仍将本属四川的打箭炉、里塘、巴塘纳入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可见，其对当时西藏区划范围的记述是不够严谨的。至嘉庆十七年，距完成川藏划界一事已85年，朝野上下对于川藏分界尤其是西藏区划范围已形成基本认知。在此认知背景下，嘉庆《四川通志·凡例》明言：“西域自巴塘以东已入雅州疆域矣，其乍丫、察木多以西，前藏、后藏去京师将二万里，地处绝徼，天文、輿地、食货、人事皆与内地悬殊，列圣德威西被，无远弗届，前后藏及廓尔喀均隶职方，咸遵正朔，今别立西域一志，凡

<sup>①</sup>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卷17，第14页。

<sup>②</sup> 陈若霖：《重修四川通志序》，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祐等纂：嘉庆《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第2页。

天文、輿地诸门分晰记载，附以重臣政绩名流艺文，以见四夷守道之义，昭一统无外之模焉。”<sup>①</sup>由此可知，因地域范围更加明确，相比之下，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更能如实反映其时西藏地情。

### 三 史料来源

汪仲洋在编纂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过程中，为求使该志内容更加翔实具体而参引大量前人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嘉庆《四川通志》编纂体例要求，汪仲洋将其中绝大部分参引内容如实标明出处，这种实事求是的编纂观念值得肯定。据笔者统计，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所参引史料及次数如下表：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史料来源表

序号	所引作品	引用次数	备注
1	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	256	
2	雍正《四川通志》	69	
3	《卫藏图识》	31	
4	《旧唐书》	24	
5	《明史》	13	
6	《水道提纲》	9	
7	《西藏志》	4	
8	《宋史》	3	
9	《后汉书》	2	
10	《新唐书》	1	
11	《元史》	1	
12	《大明一统志》	1	
13	《云南通志》	1	
14	松筠作品	22	《曲水塘》《白地塘》《春堆》《西招纪行图》《江孜》《巡边记》《彭措岭》《定日阅操》《莽噶布蔑》《宗喀》《济咙》《罗罗塘》《协噶尔》《密玛塘》《丁巳秋阅吟》《过洋河阿拉山》《拉错海子》，另引《西招图略》5次

<sup>①</sup> 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祐等纂：嘉庆《四川通志·凡例》，第15页。

(续表)

序号	所引作品	引用次数	备注
15	王我师作品	18	《马上吟》《南墩》《谷黍》《普纳》《江卡》 《阿布拉》《石板沟》《阿足》《洛家宗》 《雨撒》《昂地》《包墩塘》《蒙堡塘》《察 木多》《藏炉总记》《藏炉述异记》《墨诸 工卡记》《得庆记》
16	杨揆作品	18	《皮船》《瓦合山》《黎树山》《嘉玉桥》 《边坝》《鲁工达》《丹达山》《禄马岭》 《甲错白》《札什伦布》《热索桥》《自宗喀 赴察木即事》《又过察木卡》《廓尔喀纪功 碑》《纪功碑后诗》《东觉山》《蚂蟥山》 《布鲁山》
17	马若虚作品	9	《工布观菜花词》《西藏杂诗四首》《西招春 夜二首》《西招杂咏》《登龙冈雪后观猎》 《唐柳词》《西招白牡丹》《西招虞美人词》 《后藏》
18	吴省钦作品	3	《藏枣》《藏香》《藏氍毹》
19	查礼作品	3	《西域行序》《藏纸》《西域弓矢歌》
20	尤桐作品	2	《颂佛曲》《乌斯藏竹枝词》
21	白居易作品	1	《新乐府·缚戎人》
22	唐仪凤作品	1	《西域志》
23	岳锺琪作品	1	《西藏口占》
24	颜检作品	1	《卫藏》
25	毛振翮作品	1	《西藏折梅记》
26	方积鱼作品	1	《通塞外杂诗》
27	李菊圃作品	1	《西域述记序》
28	和宁作品	1	《西藏赋》
29	福康安作品	1	《重修双忠祠碑记》

由上表可知，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史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广泛参考官修通史、通志类著作。首先，汪仲洋引用频次最高者为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汪仲洋在书中仅标明“一统志”，但并未明确是康熙《大清一统志》还是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不过，书中所引“一统志”的记事时间下限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御赐扎什伦布寺匾额一事。据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载：“乾隆四十五年，御赐匾额曰‘福禄恒护’，乾隆四十六年，御赐匾额曰‘寿相禅宗’、曰‘宝地祥轮’，四十八年，额尔德尼于寺内新盖寺一所，御赐名曰‘寿宁’，四体书额，佛殿匾额曰‘祥轮普护’。其余境内有名之庙共十九处，皆有喇嘛数百人。”<sup>①</sup>再看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此段记述，与其别无二致，由此可确定，汪仲洋所引“一统志”即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的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

其次，汪仲洋引用次数最多的私纂方志作品是《卫藏图识》。在其编纂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之前，已成书的清代私纂方志作品有《藏纪概》《西域全书》《西藏志》《西藏志考》《西藏考》《西藏记》《西藏纪述》《西藏见闻录》《西域遗闻》《卫藏图识》《三藏志略》《西藏赋》《卫藏通志》《西招图略》等。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值清中央政府出兵平定廓尔喀侵藏之际，马揭、盛绳祖合纂的《卫藏图识》在四川尤其是川边涉藏地区广泛刊行，成为入藏官兵行军的重要指南。正如《卫藏图识·例言》所云：“山川道里，皆行役者所必经，风土人情，亦省方者所必重。兹于某处至某处止，分绘一图，随图记程。至山川、事迹，别为识略以详载之，不敢稍有挂漏，贻识者讥。……是书所集，只取记载详明，俾从军者便于检阅，故先括总叙于图前，随列程站于图后，凡非道里所经，不及细载。”<sup>②</sup>由此，因地域因素，汪仲洋就近选择大量参引已被入藏官兵实践检验过的《卫藏图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嘉庆《四川通志》卷196《西域志余》所载内容，除了在开篇“西藏历算”处以小字标明“见旧藏志”外，汪仲洋并未对余下内容标明出处，但据笔者比对，此卷内容均出自《卫藏图识》。此卷所载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西藏历算、节令、军队、刑罚、赋税、服饰、饮食、礼节、婚姻、丧葬、建筑、占卜、贸易、粮台、宗教、物产等。其中，历算内容并未见于汪仲洋所言“旧藏志”即《西藏志》，事实上，包括“见旧藏志”之注在内，此段内容均抄录自《卫藏图识·图考》，同时，此部分其他西藏简况内容，亦均抄录自《卫藏图识·图考》。此卷所载后一部分内容是自成都入藏程站，包括“自打箭炉至里塘”“自里塘至巴塘”“自巴塘至察木多”等，均完全抄录自《卫藏图识·程站》。同时，书中“诸路程站附”所含“自打箭炉由霍尔德革草地至察木多路程”“自察木多由类乌齐草地进藏路程”“前藏由挾鲁分路至后藏路程”等，亦完全抄录自《卫藏图识·诸路程站附》。值得一提的是，汪仲洋在此卷中对所参引内容做了两处适时性调整。其一，《卫藏图识·程站》载：“巴里郎进沟三十里，上赛瓦合山（‘通志’作‘朔马喇山’）。”<sup>③</sup>对此，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将“通志”改做“旧志”。其二，《卫藏图识·诸路程站附》载：“五十里至多洛巴兔儿（系川甘交界处，现今大兵进藏，甘省安设台站应付止此）。”<sup>④</sup>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此处删去了“现今”二字。

① 和坤等纂修：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3《西藏》，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竹简斋石印本，第7页。

② 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例言》，乾隆五十七年刻本，第1—2页。

③ 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程站》，第42页。

④ 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诸路程站附》，第27页。

第二,大量引用私人涉藏诗文作品。入清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力度不断深化,中原地区入藏官兵、商旅、文人日渐增多。正如吴丰培先生所言:“迨乎清初,叠加封号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寻将地方行政直隶中枢。后驻藏官员之瓜代,军旅人士之往返,所以记程之作,渐有流传。”<sup>①</sup>尤其是在康熙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朝平定廓尔喀入侵期间,大量官兵与幕僚经由西宁、四川、云南入藏,由此留下诸多涉藏诗文作品,这为汪仲洋提供了大量可参引的文献资源。其中,汪仲洋参引数量相对较多的是松筠诗文作品《西招图略》《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与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相同,马摛与盛绳祖《卫藏图识》、驻藏大臣和宁《西藏赋》、驻藏大臣衙署编纂的《卫藏通志》以及驻藏大臣松筠《西招图略》《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等涉藏作品,均是在清中央政府平定廓尔喀侵藏、积极改革藏政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汪仲洋选择较多地参引其中成书年代最晚的松筠诗文作品,亦是其当时可见的最新涉藏作品,这反映出汪仲洋在史料甄选方面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与前瞻性。另一方面,松筠涉藏诗文作品的可信度相对较高。松筠(1752—1835),字湘浦,一作湘圃,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任封疆大吏长达四十余年,其中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四年(1794—1799)任驻藏大臣。松筠在藏期间,正值廓尔喀之役后西藏地方社会重建期,其认真执行清中央政府出台的《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留心藏政,豁免粮赋,捐银恤贫,重视边防,由此形成了个人“筹藏观”。同时,松筠躬身巡边,重视地理,分别于乾隆六十年春、嘉庆二年秋、嘉庆三年春三次巡阅西藏边防,其留心记录,勤于著述,先后纂成《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招图略》,由此可见,其作品多为亲身实地踏查所得的一手资料,真实性与可信度均有保证,而汪仲洋选择较多地参引松筠诗文作品亦属顺理成章。对于松筠《西招图略》等作品,汪仲洋在《以所撰〈西域志〉六卷呈松相国得长句一首》中给予高度赞誉:“继于成都书肆中购得相国所著《西招图略》,一图一说,虽万里之外番程蛮徼,无不了如指掌,然后稍知藏卫门径,参涉他说,遂咸卷帙。其时省志之例,巴塘以东划为内地,故自察木多叙起,由近而远迄于外番者,所为体圣朝怀柔无外之意。相国之书自廓尔喀叙起,由远而近达于内地者,所为寓万国梯航、恐后之诚,体制虽殊,其旨一也。顾相国之书,皆身亲阅历,较诸仲洋之臆度凿空者天渊迥别。”<sup>②</sup>

此外,汪仲洋较多地参引位高权重的松筠的诗文作品,也有其个人政治投机目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即嘉庆《四川通志》刊行次年,汪仲洋赴京参加吏部举行的“举班大挑”,得益于松筠慧眼识珠,汪仲洋得授浙江钱塘河工之缺,由此踏上宦途。对于松筠的知遇之恩,汪仲洋在诗中三次提及。道光元年,时任吏部尚书松筠来浙江审案,时任海盐知县汪仲洋遂将所编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呈递松筠,并做诗《以所撰西域志六卷呈松相国得长句一首》,表达对松筠的敬仰与感激之情。“兹幸相国奉命而来,而仲洋适得以负弩之迎,效横经之问,此书之幸,不第此生之幸也。敬赋长句。……记从束发到壮岁,今之韩富闻我公。德望崇高位尊重,不敢为文求自通。青羊市上得图略,指画西招山万重。足迹所到手亲录,不似书生言凿空。……熟读颇识刺萨路,志局编纂充书佣。……书成无处质舛缪,吾所未信心如春。当时内阁与挑发,幸从清秘瞻仪容。二十人中荷赏拔(大挑日,成邸尚未属目,相国曰某人好,遂入选云),释褐初邀一

① 吴丰培编:《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②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卷17,第7页。

命荣。”<sup>①</sup>同时，汪仲洋《忆梦》云：“既经入选复出选，此人太好邀改更（挑河工日，成邸业已入选，蔗林相国、松圃尚书云此人太好，遂复避免）。”<sup>②</sup>其《寄呈相国松湘浦夫子即寿八秩之庆》亦言：“又忆赴挑选，内阁初趋跽。覲面报名后，仿佛识容光。相马不以瘦，竟许侂腾囊。感激思于谒，投刺羞傍徨（丁丑大挑，为公赏拔入选）。”<sup>③</sup>

#### 四 价值与不足

常明指出嘉庆《四川通志》较雍正《四川通志》内容上丰富许多，“视旧志撰次较为得体，而卷帙之增不啻十倍过之。夫江水出于巴萨，过拉木山，黑水实为喀喇乌苏河，此桑经郦注未悉之山川也。职贡极于廓尔喀，郡县列于大小金川，此尧封禹甸未辟之疆域也。粮站抵于唐古特，屯戍接于巴勒布，此汉主唐宗未立之边防也。……江源绘于蕃部，天文画于鹑首，此唐求未缉之图经也。茶纲通乎藏卫，盐井济于滇黔，此班固未书之食货也”<sup>④</sup>。方志的基本任务即如实且及时地记载一方地域变迁，而常明倡修嘉庆《四川通志》的主要目的即如实记录雍正《四川通志》面世后数十年间，四川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与变化实情。值得注意的是，常明所列举之山川、疆域、粮站、图经、食货等增修之例，均与西藏的发展变化有关，而这也正是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汪仲洋所编《西域志》在嘉庆《四川通志》中的重要价值。

第一，该志虽沿袭了雍正《四川通志·西域》的编纂体例，但在篇目设置方面有所创新，所载内容更加丰富。首先，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国朝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西域蕃酋》等3个篇目独具特色，为之前清代西藏方志所未见，属于编纂门类创新，也为之后西藏方志编纂提供了有益参考。其次，在内容体量方面，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仅1卷，而该志共6卷、约11万字，同时，其所载内容相比之前的《藏纪概》《西域全书》《西藏志》《卫藏图识》等清代西藏方志更加丰富全面、可信度更高。

第二，该志在史料参引方面大量引用时人涉藏诗文，这是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一大编纂特色。这些诗文作者均为因公亲身入藏或任职于川边藏区的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官员或幕僚，其诗文作品多为各自实践所得的一手资料，而汪仲洋参引此类诗文作品，使志书更具可读性。值得一提的是，光绪间成书的《西藏图考》即大量借鉴了该志所载内容，尤其是将该志所载松筠、王我师、杨揆等当朝官吏所作涉藏诗文、游记等作品全盘抄录。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比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的《嘉庆重修一统志·西藏》与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可知，前者并未参引后者所载内容，原因在于：《嘉庆重修一统志·西藏》依然延续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西藏》框架，仅包括西藏建制沿革、风俗、山川、古迹、津梁、祠庙、土产等7部分，而反观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载这7部分内容皆抄录自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因此，这也反映出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所载部分地情信息严重滞后。例如，关于察木多、西藏等地的户口记载，仍抄录80余年前成书的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所载的雍正十年（1732）的户口数据，而前藏物产内容则引自《旧唐书·吐蕃列传》。方志的“资治”价值有赖于志书所载信息的时效性与准确

①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卷17，第7—8页。

②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卷17，第6页。

③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卷17，第14页。

④ 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祐等纂：嘉庆《四川通志》，第3—4页。

性,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此类过时数据,对全书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必然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所载内容有误或缺漏。《西域全书》《西藏志》《西藏记述》等清代西藏方志均载驻藏大臣制度始于雍正五年驻藏的僧格,但值得注意的是,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中《国朝驻藏大臣题名》则起自乾隆十五年(1750)驻藏的那木扎尔,这一偏离史实的描述无疑会给后世带来误导。同时,在该志《国朝达赖喇嘛》所载八世达赖喇嘛罗卜藏丹碑旺楚克江巴尔嘉木磋的生平中未载卒年。实际上,八世达赖喇嘛圆寂于该志编纂之前的嘉庆九年(1804),该志在“嘉庆年”与“示寂”之间却出现两处留白。此外,该志将前藏与西藏混用,这也不利于后世的阅读与认知。

三是标引失当。首先,引用标准不一。例如,有关前藏物产内容引自《旧唐书·吐蕃列传》,而阿里物产内容则引自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其次,引用有误。例如,该志有关乍丫城池的记载为:“城池:乍丫土城周围约百余丈(旧通志)”<sup>①</sup>,这一描述十分笼统模糊,实际上,雍正《四川通志》并未载此内容。再次,引而未注。除了前文所述卷196全文出自《卫藏图识》却未标注外,该志所述察木多之“投诚番地”及类伍齐之“形势”“风俗”“城池”等内容,均抄录自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但汪仲洋却未如实注明出处。最后,引用过度。汪仲洋参引了众多时人涉藏诗文,但也存在多处过量引用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卷192《西域志二·前藏上》在叙述西藏基本史实时,汪仲洋不仅引用了《后汉书·西南夷传》、白居易《新乐府·缚戎人》,而且连续大幅度引用福康安奏折、尤桐《颂佛曲》、王我师《藏炉总记》与《藏炉述异记》、李菊圃《西域述记序》、和宁《西藏赋》、岳锺琪《西藏口占》、松筠《西招纪行诗》、颜检《卫藏诗》、马若虚《西藏杂诗四首》《西招春夜二首》等诸多诗文,如此行文明显过于繁冗,不仅给人以编者故意堆砌史料、卖弄文辞之感,而且过多的文学诗词描述也削弱了志书语言的客观性与严肃性。

综上所述,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汪仲洋汇集多种史料而编纂的书斋作品,其既未曾深入藏地考察,此前又对西藏一无所知,因此,志中所载难免错漏。但总体上看,该志体例得当,质量上乘,门类有所创新,所载西藏地情内容亦为清代西藏方志中最多者,对之后西藏方志编纂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更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本文责编:周全

<sup>①</sup> 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祐等纂: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第5页。